

“夺回我河山”

——李兆麟传略

刘 枫 李颂鸾

一

李兆麟，曾用名张寿箴，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辽宁省灯塔县小荣官屯一个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李文彬早年在外读书，后来也一直在外谋生。1916年春，刚满六岁的李兆麟被他的祖父送进学堂；1922年于小荣官屯高小毕业后，又到大荣官屯上了二年私塾。他孜孜不倦地读了很多经史古籍。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禹王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对他影响颇深。他当时精心绘制了一幅大禹治水事迹图，赞扬禹王的功绩，憧憬着自己未来也要为老百姓干一番大事业。

1925年父亲去世，家境窘困，李兆麟不得不辍学务农。这期间，他曾主动替一位被霸占土地的妇女打官司，为她写呈子告到法院，结果官司打赢了。从此李兆麟对于法律有了兴趣，开始攻读他父亲读过的法律书籍，期望将来能通过法律，解决社会的弊端。他在书箱门上刻了“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表达自己未来的远大抱负^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在国民党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下，祖国东北的

^①见《东北烈士纪念馆抗日战争陈列简介》。

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

年轻的李兆麟，目睹祖国东北的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践踏，三千万骨肉同胞被蹂躏，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他暗暗地发誓：绝不当亡国奴，要抗日救国。恰好这时，同乡的爱国青年张一吼已在北平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寄信给李兆麟，让他迅速到北平参加抗日活动。李兆麟当即把要去北平的打算讲述给母亲。已经失去了丈夫的母亲舍不得让唯一的儿子离开自己。李兆麟理解母亲的心情，就耐心地给她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表明自己是一个青年人，怎能眼看敌人宰割我们的国土不挺身而出呢？李兆麟的母亲杨长秋是一位深明大义妇女。她听了儿子一番述说之后，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并和儿子一起说服了年迈的公公。李兆麟把刚收获到家的一车大豆卖掉作路费，于1931年11月8日离开家乡，奔赴北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北平的东北籍同乡立即于奉天会馆召开会议，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救国会的常委和执委中，有我党的地下党员。他们通过救国会在东北青年中进行工作，号召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①。

李兆麟到北平后，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认识了在抗日救国会担任常委的地下党员冯基平（化名冯乃革）和执委夏尚志。李兆麟见到他们象找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高兴，便热情地介绍东北辽阳一带自发的反日武装的情况，并建议党组织派人去加以领导。冯基平和夏尚志见李兆麟救国心切，态度诚恳真挚，对党的认识也比较清楚，就吸收他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此，这位热心寻求真理，立志抗日救国的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在北平期间，李兆麟在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他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任务，便缴纳一笔学费进入了华北大学，以一个大学生的合法身份为掩护，曾到过门头

①访问冯基平、夏尚志记录（1964年5月9日）

沟煤矿和西郊农村，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1931年底，在北平团市委工作的胡乔木根据党组织的部署，派共青团员林郁青同李兆麟、张一吼一起回东北组织辽阳一带的义勇军。对此，李兆麟十分高兴。他找党组织派人回东北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心愿终于实现了^①。

1932年刚过完春节，北平市委决定冯基平作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同李兆麟、杨寿天一道来到辽阳。不久，孙志远、夏尚志、林郁青等也到了辽阳。在冯基平领导下，经过讨论研究，决定由李兆麟利用同乡和同学的关系公开出面进行活动。李兆麟骑着家里的一匹白马，冒着风险，奔驰在辽阳一带自发的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之间。经过李兆麟的奔走和工作，以苏景阳的骑兵为基础，把在辽阳地区活动的“长江”、“燕子”等山林队和一部分自发的抗日队伍都联合起来，共有一千多人，于同年旧历2月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苏景阳任司令。李兆麟把冯基平带去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委任状发给了苏景阳。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成立以后，活跃在辽阳一带。在攻打铍子沟矿井的战斗中，活捉了日本矿长久留岛；在辽西地区，义勇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投降日军的洪盛团，消灭了这支三百多人的土匪队^②。后来，这支抗日队伍在日寇疯狂进攻下失败了，但是它在辽阳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兆麟等在组织义勇军的同时，还在小堡、小荣官屯一带建立起农民抗日救国会。李兆麟的家就是当时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前后有十几名地下党的领导同志曾在他家里居住过。李兆麟不仅自己献身革命，而且把他的母亲、妹妹和堂兄弟等亲属都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他把家里的八十元钱拿出来作为活动经费，并派人到奉天城里买回来两台油印机。夜深人静时，他和几个同志围坐在小油

^①胡乔木给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复信（1980年9月14日）。

^②访问冯基平记录（1964年5月、1980年9月）。

灯下，刻蜡板、印传单，然后组织农民和儿童中的积极分子，秘密到双龙寺、三块石、十里河和铎子沟等地散发和张贴。敌人虽然到处追查，但却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

经过这一段实际斗争的锻炼，李兆麟的觉悟更加提高了。1932年5月，他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奉天特委派李兆麟到本溪煤矿工作，化名孙正宗，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反日活动。他通过爱国青年杨坚白的介绍，进入本溪煤矿当了矿工。接着奉天特委又派地下党员侯薪（化名侯维民）和孙已泰（化名王子明）来到本溪。他们三人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麟被选为负责人。

李兆麟和侯薪、孙已泰一边从事挖煤、推车、看水泵等劳动，一边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把进步工人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很快地建立起秘密的抗日救国会，会员迅速发展到三百余人。

在本溪煤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李兆麟亲身体会了旧中国矿工的悲惨处境，尝到了挖煤工人的辛酸。他受过日本监工的气，挨过工头的打，吃过发了霉的窝窝头……。所有这些，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使李兆麟染上了严重的肺病。1933年2月，他被奉天特委调回奉天休养治病，组织上还派人从乡下把他母亲接来照顾。李兆麟在奉天一面治病，一面工作。病愈后被分配在奉天特委军委任干事兼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这时，他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兵运工作中去。他在治病期间通过乡亲关系结识的崔军医，是伪靖安军中一位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他以找崔军医看病为名，经常出入于北大营和东山嘴子的伪靖安军兵营。一些士兵和军官经过李兆麟的教育和帮助，都表示愿意走抗日救国的道路。策动伪军起义的工作，进展很顺利，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这时，奉天特委被破坏，特委的领导人和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李兆麟的家被搜查，母亲和妹妹也遭逮

捕。敌人的镇压愈疯狂，李兆麟革命的意志愈坚决。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一个人又坚持了四十多天的工作。但由于和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加上叛徒特务的监视，使他无法在奉天继续活动，遂决定去哈尔滨寻找党的组织。

二

1933年8月初的一天，李兆麟来到了哈尔滨。第二天，他在道外天泰客栈同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接上了关系。李兆麟向冯仲云汇报了奉天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在谈到许多被捕的同志可能牺牲在狱中时，他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两位初次见面的战友为党的组织遭到破坏而难过，他俩互相勉励，表示要为革命挑重担，弥补党的损失。后来，冯仲云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说：“兆麟同志当时还是个青年，他的英俊和诚恳，在我的脑海里立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此后，党分配李兆麟担任了满洲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

中共满洲省委于1933年5月接到了中央1月26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后，召开了扩大会议，作出了贯彻中央指示的决议。会后，李兆麟（化名张玉华）受满洲省委的派遣，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先后到北满的巴彦、海伦巡视工作，传达“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决议，帮助当地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

同年9月，赵尚志、李启东等七名同志，从孙朝阳部拉出来与珠河县委取得了联系，准备建立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武装队伍。中共满洲省委得知这个消息后，派李兆麟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赴珠河。

李兆麟到珠河后，见到了赵尚志和李启东。他们一起经过细致地讨论和研究，制定出建立游击队的原则和活动计划。1933年10月10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正式宣告成立，赵尚志任队长，从

^①冯仲云：《东北抗联中领导者之一张寿钱》（1946年2月）。

此，珠河地区便出现了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支武装很快地发展成珠河地区反日武装队伍中的核心力量。

当时在珠河地区除有党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伍外，还有数十支山林队和义勇军的队伍。这些队伍首领的出身、反日程度、对群众态度各不相同，对珠河反日游击队所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为了扩大反日统一战线，游击队与反日义勇军订立了反日作战协定。1934年初，满洲省委为加强对珠河县委和游击队的领导，派秘书长冯仲云到珠河县委工作，派军委负责人李兆麟（化名张寿箴）到珠河游击队工作，任游击队副队长。

李兆麟到珠河游击队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协助赵尚志召开了各义勇军和山林队的首领代表会议，建立了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①。游击队与义勇军初步联合之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联合军的势力越来越大。这时珠河游击队的队员发展到130余人，再加上义勇军和山林队，联合军共有近500人的队伍。珠河游击队领导人为了打击敌人，以壮军威，决定西进攻打宾州城。

赵尚志与李兆麟于5月中旬率领联合军攻到宾州城下，被围困在城内的守敌惊恐万状，一小时内给哈尔滨的日军连打七次电话求援。敌人由哈尔滨派来四五架飞机、近千人的增援部队。我军与日伪军展开英勇战斗，用木炮攻城，打死打伤敌人七八十名，还击落敌机一架。“木炮打宾州，威震敌胆”，被传为抗日佳话^②。

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珠河反日游击队于1934年6月29日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在珠河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吸收山林队和义勇军，建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的决定。第二天召集指战员大会，宣布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编成。哈东支队设司令部，司令为赵尚志，李兆麟为政委，参谋长为梁

①《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巡视珠河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1934年8月26日）。

②《中共满洲省珠河县委报告》（1934年8月26日）。

佐术。

哈东支队司令部下辖三个总队。赵尚志率第一总队活动于宾县三岔河一带，李兆麟率第二总队活动于珠河铁道南游击区，韩光率第三总队活动于珠河铁道北。他们时分时合，痛击敌人。为了打击敌人从秋季开始向我军“讨伐”的反动气焰，扭转与我联合的山林队、义勇军由于“黄泡”、“九江”队叛逃后而出现的动摇情绪，哈东支队在赵尚志、李兆麟的领导下，决定攻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哈尔滨东南重镇，守敌约有五百多人。我军在赵尚志、李兆麟率领下，集中了三百余人的兵力，于1934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经过一场激战，攻克了这座重要的城镇。五常堡战斗，是哈东支队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扭转了义勇军中存在的动摇情绪，而且振奋了军队的士气，扩大了党和哈东支队的政治影响。随着哈东支队的发展和巩固，珠河游击区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大。到1934年秋，游击区的范围比游击队建立的初期扩大了三倍。从原来的珠河，发展扩大到延寿、宾县、五常、双城五个县的十二个区。根据地内党领导的群众反日会组织和农民武装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1935年1月28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义军等队伍参加，正式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被分配到二团任政治部主任，和团长李熙山一起，率队活动在珠河铁道南、五常、双城一带。

1935年1月第三军宣告成立以后，日寇对这支队伍的“讨伐”一次接着一次。敌人在春季“讨伐”失败之后，紧接着又发动了夏季的“讨伐”，其主要目标和重点又是集中对着三军和珠河游击区。三军司令部为避开日伪军对我主力部队和游击区的连续进攻，决定于五月下旬率一团向东转移。这时，李兆麟由二团调到一团，随司令部一同到牡丹江沿岸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并按照

省委的要求,与汤原、饶河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作战。当部队到达方正大罗勒密一带时,遇到大量日伪军在牡丹江沿江一带的阻击。赵尚志和李兆麟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在延(寿)方(正)一带进行活动。从地理上看,这里可以建成我军后方的根据地,三军司令部和一团着手在这里建造密营。

延、方地区是义勇军“三省”、“五省”的活动地盘,对我军在此开辟游击区,建造后方密营不给予支持和合作,双方出现了一些摩擦。就在这时,随三军一起活动的谢文东、李华堂的队伍,产生了脱离三军的倾向。他们表面上同意与三军东进,暗中却凭借三军的威信恢复自己的势力,阻止三军东进和在延、方建立后方根据地。由于出现这些情况,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返回珠河游击区,留下李兆麟、刘海涛率领的一团在此地继续开展活动。

李兆麟十分注意贯彻党的政策,善于团结兄弟部队,重视同其它部队搞好关系、协同作战。当他和刘海涛率三军一团活动到方正大罗勒密地区三家子屯时,主动地与李延禄率领的四军会师。李兆麟和一团的干部在四军军部看到了经吉东特委转来的党的《八一宣言》,并与李延禄一起学习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酝酿建立联军、协同作战等问题。最后两军决定联合攻打南刁翎,拔掉敌伪据点。

9月16日,联合部队对南刁翎发起进攻,胜利地占领了这个镇子,伪军保安队一百余人反正,伪警务营长率部投降。我联合部队乘胜前进,紧接着又占领了林口。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用战斗的胜利,来纪念“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日。

三

1935年夏,三军司令部在赵尚志率领下从延、方地区回珠河游击区。这时,敌伪的夏季大“讨伐”开始了。他们集中了六个县的几千名敌伪兵力,从7月21日开始对珠河游击区反复地进行

“扫荡”和烧杀。珠河县委在8月11日关于敌人烧杀游击区的情况向省委的报告中说：“敌人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我路南游击区除离铁道线十余里地之地方未被焚烧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已成一片焦土”。敌人对路南游击区疯狂地进行焚烧之后，又对路北游击区继续进行烧杀，被烧毁的房屋，“也有三分之二以上”

在敌人推行“匪民分离”的政策下，失去房屋的广大群众被赶进新归并的大屯，使我军与群众的关系被割断。珠河县委决定赵尚志率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转移，到汤原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李兆麟率领三军一团留在这一带活动。为贯彻《八一宣言》的精神，11月间三军司令部在勃利西青山里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将东北反日联军总指挥部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会后，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与五团过松花江，经通河到汤原，李兆麟、刘海涛率一团暂留依勃一带继续坚持活动。

1936年1月26日，赵尚志在汤原县境召开了北满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李兆麟出席了这次会议，被推选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会上根据《八一宣言》精神，经过协商于1月28日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设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会后，各军分开活动，三军与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联合进攻夏亮子河金矿，取得了胜利。在三军帮助下，汤原游击队于1月30日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被派到六军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此后，三、六军共同着手建立汤旺河后方军事根据地，组成了由李兆麟为主任的三、六军后方留守处。留守部队是由三、六军各抽一部分队伍编成的。李兆麟担负起领导建立汤旺河后方军事根据地的任务。3月19日李兆麟接到联军司令部赵尚志的命令，要他迅速组织部队，坚决、彻底地消灭盘踞在岔巴旗、老钱柜一带以“四炮”为首的森林警察大队，以便把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控制在我军手中。李兆麟接到司令部

的指示后，立刻召集汤原三、六军留守部队和六军四团等部队，传达了司令部的指示，进行了战斗部署，并亲自担任这次战斗临时指挥部的总指挥。他率领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向汤旺河前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首先到达汤旺河西岸小兴安岭西南山的岔巴旗——森林警察大队的第一道卡子。经过一场激战，活捉了黄毛、丁山、张保安、宫四炮四名警察中队长及全部森林警察，缴了他们的枪支和弹药。我军乘胜前进，第二天黄昏到达老钱柜，一举歼灭了盘踞在这里的森林警察大队，击毙日本指导官以下7人，俘虏警察150余人，缴获其全部枪支弹药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战后，李兆麟率领战士满载着胜利品返回驻地。这次战斗完全达到了预定目的。三、六军在汤旺河一带建立了许多密营，在沟里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和医院，成了三、六军进行整休和训练的后方基地。三、六军在沟里还建立了军政学校，校长由赵尚志兼，李兆麟担任教育长，这所学校连续办了三期，学员们在这里上政治课，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坚定抗日救国的决心，同时也进行军事训练，为北满抗联各军训练和培养了许多骨干。

1936年11月，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决定撤消满洲省委，按东北已有的四个游击区分别建立四个省委。北满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领导人，于9月1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北坡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当时在巴（彦）、木（兰）一带活动的李兆麟被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此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为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1937年初，北满省委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正式改称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下辖三、六、九军和祁致中领导的独立师，仍由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

这期间，李兆麟在参与指挥战斗的同时，还紧张地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南北两岸地区，为统一北满各军的思想，加强部队团结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扩编成十一个军。这支抗日队伍，在白山黑水之间，纵横驰骋，打击敌人，钳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全国抗战。

日本侵略者为把东北作为向中国内地进攻的后方基地，在“七七”事变前后，疯狂地破坏东北地区我地下党的组织，“围剿”我抗日联军，压缩我抗日游击区。它以大量的日伪军从中东路、牡丹江、老爷岭向西，从宾县、珠河然后向北，在巴彦、木兰、庆城、铁力、海伦一直到黑河地区形成一个包围圈，逐渐把北满抗联各军压缩到松花江下游地带，企图达到“聚歼”的目的。针对这种形势，北满临时省委于1937年6月28日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活动在三江平原地区的抗联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到小兴安岭西麓敌人暂时统治薄弱的黑嫩平原，依托山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为加强对三军的领导和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根据赵尚志的提议，决定李兆麟兼任三军政治部主任职务。李兆麟回三军后，根据省委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精神，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在与军长赵尚志研究之后，决定向各师发出指示，号召全军发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英勇杀敌的作风。经北满临时省委同意，他还将军事学校的教官和学员全部派到三、六军各部队中，以充实和加强军政工作的骨干力量。这些措施对三军的发展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年8月，抗联三军和六军根据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议开辟新区的决定，派出了西征先遣队。李兆麟以北满临时省委代表、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各军之间，为协调各军之间的关系，整顿部队，做好开辟新区的准备，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艰苦工作。他在回忆自己这段历史时说：“与我共同工作的任何同志都是热心救国的萍水相逢、他乡之客”，我实愿意将抗日救国主张深入到每个中国同胞的脑海里。他好能

同我携手共同去进行光荣的神圣事业”①。

11月间，在工作十分紧张、繁重的情况下，李兆麟拿出了十天的时间做独立师师长祁致中的工作，耐心地给他讲解党的政治主张和如何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的道理，坚定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在党的帮助下，祁致中领导的独立师改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1937年冬，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东北抗日联军集中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进攻。战争空前激烈和残酷。我抗日联军虽奋力反击，歼灭了大量敌人，但部队损失较大，游击根据地日益缩小，衣、食、住和枪支弹药均发生困难，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1938年1月，六军军长戴红滨率队护送北满省委代表赵尚志赴苏商谈重大问题。为配合这一行动三军决定发起一次对敌的攻势，指定三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率三军十师和六军二师共二百余人、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率一百二十余人，分别攻打鸭蛋河和萝北县城。此举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在敌集中大部兵力切断我军退路的危险关头，三军一师和六军二师被迫撤到苏联境内。李兆麟率一百余人攻打鸭蛋河之后冲破敌人的封锁，来到萝北老龙岗附近又与二百名日军相遇，在作战中我方牺牲四名战士，再次冲破敌人的包围，把队伍带到富锦，在四区一带活动。这时，下江的形势更加险恶，日伪军集中兵力向松花江下游两岸的依兰、勃利、桦川、富锦、密山一带进行疯狂的大“讨伐”。同时，日伪军、警、宪、特机关于1938年3月15日进行大搜捕后，党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部队和群众失去联系，粮食、弹药的来源中断，战士不但每天受到饥饿的威胁，而且还要遭到几倍、几十倍敌人的袭击。

4月间，李兆麟出席在依兰县境青山里召开的北满临时省委第

① 张寿箴：《关于三军与八军关系纠纷问题的信》（1937年6月20日）。

七次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刚结束，敌人就进山袭击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张兰生率省委机关向西北方向转移。李兆麟率领部分队伍把敌人引向与省委机关转移的相反方向，边打边退，保证了省委机关的安全。接着，在依兰四块石，他们甩掉了追踪的敌人。

此后，李兆麟率六军教导队向萝北、绥滨地区转移。在路过格金河时，打退了三、四百名敌人的追击。经过长途行军，部队到达萝北梧桐河，与六军一师、五师、二师、四师会合。这时候，李兆麟接到了1938年5月23日北满临时省委给他的信，对他的活动进行了表扬，信中说：“由于你的机智积极，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你实为布尔什维克的勇士，如有你这样的不屈精神积极的努力……一定能使下江各地的各种复杂问题得到解决。”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根据下江地区形势的急剧变化，于6月初在通河县境内召开了第八次常委会议。在进一步讨论下江地区形势之后，决定各军要尽快地突破敌人对下江抗日部队的包围，组织三、六、九、十一军向西北远征。为加强对远征部队的领导和开辟西北地区的工作，要求建立西北指挥部，并指定李兆麟参加西北指挥部准备工作会议。根据三军在赵尚志去苏后无军长的情况，决定李兆麟以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三军工作，并任命金策为三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承担了领导和指挥北满抗日部队的重任。

李兆麟没有参加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议，但是，他在接到省委指示后，积极贯彻常委会议做出的关于组织部队突破重围，进行西征的决定。7月间，他在萝北老等山召开部队师团以上干部和下江特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分析了下江的形势之后，一致同意和拥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议关于西征的决定。

8月间，各军主力部队按计划陆续踏上西征的路途。为了牵制敌人，支援西征主力部队，做好下江留守部队的整顿工作，李兆麟以北满临时省委代表身份留在下江，在萝北、富锦、宝清一

带，坚持游击活动。他曾积极帮助兄弟部队摆脱险境，还冒着生命危险，带队帮助四军在富锦境内的一支留守队伍突破敌人的重围。9月间，他带领部队到宝清县境的完达山麓，与十一军张中孚、于天放率领的队伍和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率领的队伍会师。李兆麟代表北满临时省委向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和徐光海传达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关于高禹民留下江坚持斗争，负责领导下江地区全部工作的决定。为加强部队与地方的联系，让高禹民以总司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共同负责领导下江留守部队。李兆麟在传达了省委决定之后，要求他们相互配合，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下江地区的抗日斗争。10月间，李兆麟率领六军教导队180余名队员营救被围困的十一军李景荫部，并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整顿巩固这支队伍，带领他们一道踏上了西征的路程。

11月间，李兆麟从宝清来到了汤东老白山下江留守部队总部的密营。夜晚他给北满临时省委写信，报告下江地区主力部队8月间西征后，下江地区工作部署的状况。在信的最后一部分，他饱含革命情谊，深刻地表达了抗联战士和他个人在艰苦环境中乐观精神和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他说：我是无钱、无粮、无干部，过了四个月残酷斗争生活，今天正是身边最后一个铜元都花净的日子，革命热情燃烧着我，非常高兴地向着抗日的光明处狂奔①。根据三、六、九军一致西进的情况，李兆麟率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队伍，离开下江，翻越小兴安岭，向黑嫩平原远征。

这时，北满已是千里冰封的严冬季节，到处白雪皑皑。李兆麟率领的最后一批西征部队，行进在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中。战士的手和脚都冻得皴裂了，胡须和眉毛上挂着厚厚的冰霜。他们白天分成小部队行军，夜晚集中宿营，身上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每天只能从倒木上找一些干蘑菇吃，甚至把皮带剥成小碎块煮一煮吃下去。有一次，他们在第一、第二批西征部队的宿营地找

①《寿钱给省委的报告》（1938年11月16日）。

到了一些已经发霉的马皮，战士们用火烧烤时，虽然也发出一些糊香味，但放在嘴里难嚼难咽。李兆麟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为了抗日，我们必须保住生命。”他一边说，一边和大家一起吃掉了这些烂马皮。有一位大家都叫他小陈的同志，在没腰深的大雪里走着走着就倒下牺牲了。李兆麟和全体战士含着眼泪用白雪就地掩埋了他的遗体，继续在风雪中前进。

夜晚，部队在零下四十多度的森林里露营，战士们围着篝火，烤着湿透了的脚布和靴草，烤着烤着就睡着了。有一位战士因饥饿和劳累，失去控制，一头扎到火堆里牺牲了。李兆麟更加热爱自己的战士，以后每当宿营战士入睡后，他仍坐在篝火旁边，一边向火堆加柴，一边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研究第二天部队的行动计划。英勇的抗联战士，在李兆麟的率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战胜了饥饿和严寒，终于在1938年12月底到达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县境内，在白马石后方基地与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北满抗联部队的西征，是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下，在李兆麟、金策等的具体安排、组织和率领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批完成的。这次西征大军，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终于取得了胜利，保存了北满抗联的一部分主力部队和骨干力量，为后来在广阔的黑嫩平原，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奠定了基础。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在西征的艰苦岁月里，李兆麟编写了一首著名的《露营之歌》。这首由四段歌词组成的战歌，是李兆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不同地点、不同季节，一边指挥部队战斗，一边同几位同志一起切磋琢磨编写出来的。歌词如下：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渍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露营之歌》是李兆麟和抗联战士浴血奋战、英勇斗争、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充分反映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这支歌在东北

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成为鼓舞抗联战士坚持斗争，英勇杀敌，夺取胜利的有力武器。

五

1939年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第九次常委会议。根据开展嫩海地区工作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嫩海地区代表团。会后，由李兆麟领导的嫩海代表团正式组成。接着，又建立起讷河、肇州两个县委。为加强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李兆麟将西征后胜利到达小兴安岭西海伦后方游击根据地的北满抗联各部队，统一编成四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并设立了龙南、龙北两个临时指挥部。支队和独立师的总指挥为李兆麟，政治委员为冯仲云，副总指挥为许亨植（即李熙山）。第一、第二支队归龙北指挥部领导，负责人由李兆麟兼任，所属部队活动于嫩江、讷河、五大连池、龙门、通北、克山、克东一带。第三、第四支队和两个独立师，归龙南指挥部领导，负责人由许亨植兼任，所属部队活动于绥梭、海伦、绥化、庆城、铁力一带。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4月12日召开了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改北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选金策、李兆麟、冯仲云三人为省委常委，金策为书记，李兆麟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这次会议还决定撤消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以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并建立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根据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于5月30日在德都东北朝阳山后方军事根据地正式编成，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和通电。全军这时共有五百余人，从数量上看，部队人员是减少了，但部队的政治素质却有很大的提高。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龙北部队，在李兆麟的指挥和领导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4月下旬袭击了通北警察署，北进中又击破了龙门附近的紫霞宫警察分署和军用飞机场，5月5日进攻龙门火